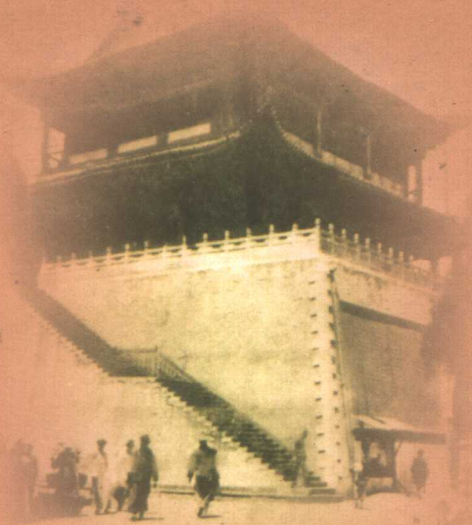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 ②

学人与学府



西南联大
四十年代昆明文化剪影

著

者

余

斌

图

片

唐

莹

余

晓

夕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 ②

学人与学府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著

者

余

斌

图片唐云笙

余晚夕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人与学府/余斌著;唐云笙,余晓夕图片.一昆明:
云南民族出版社,2003.10
(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②)
ISBN 7-5367-2765-8

I.学... II.①余... ②唐... ③余... III.随笔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4080 号

策 划:李安泰
责任编辑:郑卫东
责任校对:张 哲
装帧设计:李 木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:650032)

<http://www.ynbook.com> ynbook@vip.163.com

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制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375 字数:100 千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01-3000 定价:15.00 元

ISBN 7-5367-2765-8/I·622



余斌，文学批评家，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36年生，昆明人。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之后在西北从事文艺编辑工作，从《红旗手》到《当代文艺思潮》。八十年代末回滇从教。1997年获高校教师曾宪梓奖。出版专著《中国西部文学纵观》。代表性论文有《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》、《边疆：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重叠》和《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》。八十年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“文学评论”（中青年）优秀论文奖一次，九十年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。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城市的文化地图

——为余斌先生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而作

汤世杰

边地云南，“二战”中有两件大事，值得我们永世记取。一是滇西抗战，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，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，最终发起反攻，全歼入侵之敌，惨烈悲壮，浩气长存。一件则关乎文化——各地的文人学子，齐聚战时的昆明，群贤毕至，如灿烂群星，辉映边城。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，传道，授业，思索，研究，写作，创造，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，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，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。前者为武，后者为文，一文一武，皆可歌可泣，可圈可点，专家、学者，对之考证、研究、阐发者众，至今，仍时有新著问世。



余斌教授关注的是后者，所著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，一题三卷，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，以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，经经纬纬铺撒开去，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，日常起居，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，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，引我们徜徉其间；眼光，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，笔触则温润怀旧。如拊掌闲谈，满眼战时风雨，书生颜色，读来兴味盎然。

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，偏远也实在偏远。当年交通不便，道路滞涩，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到昆明，或一路步行，筚路蓝缕，辗转数省，或由经水路，绕道香港，风雨颠簸，都要吃些苦头。然时势所迫，数年间，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。幸好当年的昆明，气度足够的大，不仅包容、融合了各种思潮，还让各种思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，在这里生长，壮大，开花，结果。一座“西南联大”，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、人文精英，至今让人唏嘘感慨。有文章说，在美国某著名大学，出身于“西南联大”的博士、教授和研究人员，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。这数字相当惊人，是不是准确，我不好说，但我相信那个大体的估计，并无夸大。而当年的条件，却极简陋，极寒伧。看来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，从来都不出在权位之家，也与豪华别墅、妻妾如云无关。中国知识分子“价格”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当年那些文化人，既无重点学科经费，也无“专家”补贴，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，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，坐趟马车上班，已属奢侈，却一边著书立说，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，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。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，庶几只可维持温饱。比如住，那些文化先驱，学界巨擘，并不都住在“联大”校园，倒是见缝插针，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，



有的为避战火，求清静，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。所谓安定，也非有厅堂楼阁，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，或民宅、农舍，或古寺、旧庙，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。据我所知，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、麦地村、司家营、落索坡一带，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、中国营造学社、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，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、祠堂，作为研究场所。在那里住过、工作过的著名人物，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，就有哲学家冯友兰、金岳霖，考古学家李济、梁思永，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，政治学家钱端升，史学家傅斯年、顾颉刚、吴晗，语言学家李方桂、王力、罗常培，文学家朱自清、闻一多、陈梦家、光未然，音乐家查阜西、赵讽等等。在昆明的大西门、文林街、青云街一带，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，当年也藏龙卧虎，常有风云际会，高人出入。世事沧桑，人去楼空。那些房屋，或历经风雨，朽烂拆除，或遭遇改建，面目全非。尽管这些年来，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，已多有描述与探索，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，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、做学问，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，却仍少有人去涉及。

余教授乃有心之人，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赶在城市扩建、大举拆迁之前，以闲暇时光，不辞辛苦，走街串巷，远赴郊野，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，每查实一处，便欢呼雀跃，行诸文字，以昭告世人。往往他前脚刚走，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，真让人有失之分秒，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。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，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，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、简捷与干练，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。不久，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，编者、读者好评如潮，便是

意料中事了——一个人，凡用心用功做的事，用了几份心，几份功，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随后，《云南日报》“文化周刊”记者，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，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。足见社会、读者，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，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。那时我想，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，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，不就是一幅“二战”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？这幅文化地图，奇特、新颖，迄今为止，在别的地方，别的城市，还没见过。一座城市，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。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，是缺乏底蕴的城市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，当然是历史绘制的，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，知识分子，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，用他们的生命、智慧、血性与良知。余先生的功劳，在于他锲而不舍的寻微访幽，辛勤重访，校勘订正，考察标记，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，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。

“礼失而求诸野”。近些年的云南，“文化地理散文”的写作风头正劲，许多作家、学者，不畏岁月湮没，山路迢遥，踏遍山山水水，穷乡僻壤，搜寻探求云南的文化渊源，出版了不下数十部文化地理散文，一时蔚成大观。这些作品，不仅出自一般被称为作家者之手，也出自社会科学工作者、新闻工作者之手。像余先生这样，专心致志就近在昆明寻访的，却也不多；或有，也止于市井里巷，风土人情，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化人生活，甚少触及。细细想来，余先生属意此事，前有多年的魂牵梦萦，继有占尽先机的天时地利人和，当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。

先生自幼长于昆明，青春年华，负笈远行，求学他方：20世纪80年代初，远在塞上，所参与之《当代文艺思潮》，发风气之先，挟雷携电，震荡域内；80年代末回到家乡，作



为学者、教授和文学理论研究专家，于教学研究之余，转而追寻20世纪40年代昆明的文化景观，先生此举，乃出于一个当代学者，对老一代学人不卑不亢、矢志不移精神的缅怀与景仰，下笔尽管温文尔雅，看似闲情，却有真性情流露，有真见解示人。对那批文化人在昆明生活的具体环境，先生尽心尽意的描述，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“老昆明”，可藉此展示他儿时的记忆，倒是有更深一层的动因。恰如法国人文地理学“年鉴学派”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在其《大地与人类进化》一书中所说：“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，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。”地理环境或空间，不只是一种自然的、与人无关的背景或舞台，人类在对某片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，便像烟云一般消散，事实上，它像空气一样渗透、弥漫在历史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。任何人，都会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，文化人当然也不例外。他们是文人，也是常人，也要吃喝拉撒睡，也有喜怒哀乐。他们能取得学术成果，既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分，也因为这片土壤的滋养。如此，展示当年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及其文化，意义就非同一般了。同样是这片土地，后来的情形，似乎并不怎么好。个中缘由，值得研究。如果读者从本书看到的，不仅是一些史实，还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、敬业与辛劳，能给当代人以启示与借鉴，思考我们的教育，该如何改造，我们的文化事业，该如何建设，我们的社会，该如何发展，则幸甚，幸甚。

我所知道的余先生，乃儒雅之士，性情中人，说话做事，亲切平和，从不张扬，他的写作，无论专著、论文，还是随笔、小品，皆独立自主，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，决不人云亦云，也从无吹捧粉饰，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，深藏智性的

创见，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。细品余先生这类文字，几乎从不见形诸于外的“用力”之处，总是娓娓道来，行于当行，止于当止，自有他泊于自然的潇洒。这样的文字，与那些自以为可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者，真乃天上地下。他所述的那些文化人在昆明的经历际遇，不管乖僻怪异，还是中规中矩，也多随缘任运，如水流云在，很少“做意”之痕，甚而剑拔弩张之态。所记者，不管后来只是寻常书生，抑或终成旷世才俊，如今也多如已逝之水，但在余先生笔下，他们的书生意气，学问风格，脾气秉性，一如半个多世纪前边城昆明的江湖旧事，读起来仍滋味深厚，有睛光闪烁，有血丝粘连，有豪气喷洒，带给我们的，是智者思绪的超然飘逸，人生甘苦的深长回味。这样一幅“文化地图”，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，斑斓杂驳，却鲜活跳脱，凸现出的，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、血性与体温，有着沉沉的分量。一个城市，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。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，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，标明了自己的方位，这就足够了，我想。

2002年12月8日~12日

于昆明北郊

目 录

- 1 城市的文化地图
——为余斌先生《西南联大·昆明记忆》而作 汤世杰
- 1 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
- 8 钱钟书何以离开联大
- 15 说说吴晗的另一面
- 24 冯友兰的徘徊
- 32 潘光旦：《性心理学》及其他
- 38 从金岳霖跑警报说起
- 45 语言学家罗常培
- 52 爱写日记的化学家曾昭抡
- 60 不能只看他的背影
- 68 傅斯年与闻一多
- 76 昆明有条靛花巷
- 84 再说靛花巷
- 91 西南联大的红楼热
- 98 陈梦家、赵萝蕤夫妇



105	也说说冰心的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
113	北门街的“西南文化研究会”
121	伊斯兰经典翻译家马坚
129	徐嘉瑞的《大理古代文化史稿》
138	“昆明像北平”考
148	以中国为母国的柏西文老人
155	我也“见”过温德
162	白英教授：中国人民的朋友
169	中国通费正清
176	李约瑟与昆明
182	联大记得龙云
190	后 记

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



1

学
人
与
学
府

刘文典^①的狂，在联大是极有名的，虽说校内大师云集，被刘文典看在眼里的也不过陈寅恪、冯友兰、唐兰等几人。不独此也，刘文典还敢冒犯蒋介石。这可不是一般逸闻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。鲁迅在1931年写的杂文《知难行难》有如下文字：“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，因为不称‘主席’而关了好多天，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”。^②《鲁迅

① 刘文典（1889~1958年）字叔雅，安徽合肥人。1909年赴日本，从章太炎学习《说文》，辛亥革命后回国。由于反对袁世凯再次流亡日本，加入中华革命党，任党部秘书处秘书。袁氏倒台后回国任北大教授。五四前后任《新青年》杂志英文编辑。经他校勘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1923年出版。《庄子补正》于三十年代初出版。

② 《鲁迅全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四卷第339~340页。



云南大学开学典礼摄影。时间 1940 年，地点会泽院。（唐云笙提供）

全集》在此文注释“刘文典”条下作如下说明：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，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，称蒋介石为‘先生’而不称‘主席’，被蒋以‘治学不严’为借口，当场拘押，同年十二月获释。”^①

就是这么一个刘文典，后来却“栽”在闻一多手下，被迫离开联大，去了云大。

事情的起由是因为刘文典去了一趟滇南普洱县的磨黑，但此事背景比较复杂，刘文典对此亦一无所知。据当年转移到磨黑进行地下活动的联大学生萧获（即施载宣，后任《羊城晚报》编辑）《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》^②一文及其他史料，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磨黑是云南地下党在滇南活动的

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341页。

② 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十四辑。



主要据点之一。当时思（茅）普（洱）区有个大地主、大盐商、大土豪叫张孟希有权有势，是那地方最显赫的实力派。磨黑（也叫磨黑井，是滇南主要的盐井）离昆明远，又不通公路，别说国民党政府的政令行不通，连龙云对他也感鞭长莫及。张孟希附庸风雅，也讲一些江湖义气。为了满足子弟们的读书要求，磨黑办过一个补习班，任教的是一些读过私塾的家长，效果差。1941年底，张孟希派人到昆明招聘教师。当时中共云南工委和西南联大党组织，按照中央关于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的方针，正需要转移疏散一批在斗争中比较暴露的同志到各地农村去。据此，吴显钺揭榜应聘（招聘启事就贴在校园附近），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党员，这当然都是党组织研究决定的。

吴显钺等1941年底到了磨黑，先办了初中补习班，1943年春正式成立了磨黑中学。此后地下党组织又几次派党内外一些同志去磨黑（其中有写纪念吴显钺文章的萧荻），以教师职业为掩护，发展力量，终于使磨黑成为滇南的一个革命据点。

至于刘文典教授为什么也去了磨黑，那与他喜好鸦片有关。吴显钺等在磨黑干了一年，取得张孟希的信任，初步站稳脚跟。但几个人力量单薄，还需要引进一些同志来校隐蔽工作。在与张孟希的闲谈中，他们介绍过西南联大的许多著名教授，而张孟希对这位“二云居士”特别感兴趣，想请国学大师来为其母撰写墓志铭，以抬高自己的声望。刘文典愿意接受邀请，是因为张孟希保证他的生活供应，尤其是对他特殊嗜好的满足。对于邀刘一事，有的同志曾有不同意见。吴认为刘文典教授在联大虽属保守派，但并不过问政治，到磨黑后只要处理得好，不但对工作无碍，而且能将这位大师请去，还可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。几位同志的认识统一



玉溪名宅“文兴祥”（侧面）。1947年刘文典、钱穆、罗庸三教授赴玉溪游览下榻于此。（余晓夕2003年摄并提供）

了，刘文典也就这么被请去了。

刘文典一行（刘一家三口和几位联大同学）去磨黑是很气派的，张孟希的马帮专们来昆明接，还有许多小马帮“跟帮”同行，声势很大。张孟希事先派人在沿途打过招呼，一路上不光接待没问题，也未遇到土匪侵扰。刘文典一家坐的是滑竿，几位地下党骑马。一路上将刘文典照顾得很好，不光有鸦片抽，在较大的站口还有人设宴接风，所以走了近二十天才到。到磨黑那天，张孟希和当地士绅在十里外迎接，而学生们则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着迎接老师了。我设想，刘文典的这趟马帮行如果拍成影视，该是多么有色彩，多么好看。

刘文典在磨黑住了半年。墓志铭自然要写，也给张孟希



和一些读过点旧书的士绅讲讲《庄子》和《昭明文选》，大约每周讲一两次。但更多的时候刘文典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，张孟希也经常来同他谈古说今。走的时候由张孟希礼送他们全家回到昆明。张还送上好的“云土”（鸦片）十两作为“润笔”。^①

风波出现了，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不给刘文典发聘书。

联大的聘任程序是很严格的，各学院拟延聘教师，得先将教师姓名、履历、著作单及拟请担任之职名、课程及薪俸标准等材料报学校聘任委员会审查。据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提供的史料，续聘刘文典是会议通过了的，但实际上并未给他聘书。刘文典去磨黑之前虽与蒋梦麟、罗常培打过招呼，但他所担任的联大课程仍受影响，而且此行之目的在于鸦片，在学校里已引起不小反响。所以尽管会议通过续聘，但闻一多仍持异议，认为刘不足为人师表。此事刘在磨黑即已知道，为此给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信表示不满并作申诉：“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，以后得昆明友朋信，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。典初尚不信，因自问并无大过，徒因道途险远，登涉艰难，未能早日返校耳。不意近得某君‘半官式’信，云学校已经解聘，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，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，切不可再回学校，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。”尽管刘文典解释再三却迟迟不归，所以闻一多未给他安排课程。王力（了一）等同事去讲情，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，还是爱国的。闻一多发怒说：“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

^① 以上磨黑情况均据萧荻文章，并参考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中《皖南事变以后的联大校园》一节及曾乐山《曾庆铨烈士传略》（见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十四辑）有关部分。